

岷江上游城镇的成长性因素分析

李 锦

(四川省民族研究所, 四川 成都 610017)

摘 要】岷江上游的城镇是阿坝州最重要的都市化区域, 由于历史上形成的民族文化多样性特征, 岷江上游的城镇化具有发展速度快、社会组织变迁迅速、传媒影响深远的特点, 其都市化的趋势十分明显。

关键词】岷江上游; 城镇; 成长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章编号】A

【文献标识码】1008- 4142(2007) 01- 0031- 04

一、岷江上游的城镇

岷江是长江重要的支流之一, 南北纵贯, 将青藏高原东南边缘与四川盆地腹心地区连接起来。其发源地在松潘县川主寺镇弓杠岭, 沿途流经川西高原、成都平原、川南盆地, 最后在宜宾市注入长江。岷江上游主要指都江堰以上地区, 包括汶川县、理县、茂县、松潘县、黑水县, 行政区划上都由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管辖。隔弓杠岭与松潘相邻的九寨沟县, 历史上一直是松潘的属地, 今天也是沿岷江而上的九寨沟环线的一部分。由于该县在历史上、经济上和行政关系上与岷江上游的紧密联系, 本文的研究也将该县作为岷江上游的一部分。

岷江上游地区历史上是长江上游和黄河上游两大文化中心区之间的一条文化走廊。各个古代部落和现代民族间的文化交流极为频繁, 形成了独特的历史和民族文化。20 世纪以后, 随着经济的逐步发展, 岷江上游的城镇化进程加快。特别是在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 城镇化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 给岷江上游少数民族的经济、社会、文化变迁带来了巨大的动力。

(一) 岷江上游的历史变迁与民族流动

岷江上游是连接甘青和成都平原的一条民族走廊, 是藏彝走廊中六条南北通道中最重要的通道之一。自汉唐以来, 活动于此走廊的主要是羌藏两大民族及其先民, 明清以来又有大量汉族和回族迁入。

自战国以来, 岷江上游走廊大抵为古羌人所据, 是西北羌人南下的重要通道之一。羌人最早的分布区在今天青海东部的河湟地区, 大约从新石器时代后期到铜器时

期, 羌人的势力逐渐壮大和向外发展, 其分布范围遂扩大至黄河流域各地。在公元前四、五世纪时, 由于秦国的强盛和向西经略, 羌人势力被迫向西和向南发生转移, 此时有大批的羌人从赐支河曲南下, 向长江流域的上游地区迁徙。从文献资料看, 当时迁徙到岷江上游的主要有白马羌等。其迁徙线路是经松潘、茂县、汶川一线沿岷江主河道南下。到了汉代, 《后汉书·西南夷传》记当时汶山郡一带已有“六夷、七羌、九氏, 各有部落。”这说明, 在汉代, 岷江上游一带已经居住着许多氏羌人部落, 其成分多元而复杂, 但总的看来, 以羌人势力为主。

自唐代开始, 由于吐蕃的崛起及其强有力的向东扩张, 秦汉以来岷江上游走廊由羌人独占的局面开始发生变化。贞观十二年(公元 638 年), 吐蕃赞普松赞干布率大军进攻唐剑南道的西北门户松州(今松潘), 吐蕃此次进攻松州, 是先“攻破党项及白兰诸羌”, 并“率领其众二十余万”共同进攻的。松州之役揭开了唐蕃在岷江上游开展争夺和较量的序幕。至公元 670 年唐蕃大非战役后, 吐蕃“尽收羊同、党项及诸羌之地, 东与凉、松(今松潘)、茂(今茂县)、维(今理县)、隗等州相接”其版图已经明显推进到岷江上游地区。公元 763 年, 吐蕃攻陷长安, 从长安撤出后, 又联合南诏军队攻陷唐之雋、松、维、保等州占领了剑南西部大部分地区。公元 783 年, 唐蕃双方清水会盟, 规定沿岷江、大渡河划界, 以东属唐朝, 以西属吐蕃。这样, 岷江上游成为唐蕃势力的交汇地。

《新唐书·李德裕传》载, 李德裕出任剑南节度使期间曾“建筹边楼, 按南道山川险要与蛮相入者图之左, 西道与吐蕃接者图之右。”这里指的“西道”, 是指从成都平原

【收稿日期】2007—01—18

【作者简介】李锦(1965—), 女, 四川成都人, 四川省民族研究所副所长, 研究员, 主要从事民族学及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研究。

沿岷江河谷上行,经过松州、再由松州北行,经松潘草地进入西北地区,从而与当时由长安经西北一带通往吐蕃的唐蕃大道相连,由此而通往吐蕃。而西山,则是泛指成都平原以西的高山,包括当时的松州(今松潘)、茂州(今茂县)、保州(今理县境)、维州(今理县)、乾州(今汶川)等地一带的高山。

由于岷江上游一带是吐蕃军队进攻剑南道的一个重要通道,所以该地始终是唐蕃争夺的目标。唐代,松、维等州曾屡屡被吐蕃占领,而唐军由西山路进攻吐蕃,也大多同吐蕃争夺松、维、茂等地的军事重镇,以遏制吐蕃军队经此路前进。唐与吐蕃的军队进行了长期的拉锯战,其结果是吐蕃居民逐步入据了岷江上游走廊,成为当时该走廊起支配作用的民族。由于当时岷江上游诸羌经常臣服于吐蕃,为吐蕃所统治,他们自然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吐蕃文化的影响。

吐蕃王朝灭亡后,原驻守于川西和甘青地区的吐蕃军队、随军奴隶和吐蕃移民无力返回本土,史载其“无所归,其相噶合数千人,以温末自号,居甘、肃、瓜、沙、河、渭、岷、廊、叠、宕间”,这显然包括了岷江上游地区。这样,在岷江上游形成了吐蕃居民与原为吐蕃属民的诸羌部落之居民相互杂处的局面。自宋代开始,藏人据有岷江上游北端,羌人占有南段的局面开始逐步形成。宋代,以吐蕃人为主导而形成的凉州六谷部政权,在潘罗支任首领时其实力向南延伸,统治了岷江上游北部地区。

明朝为稳定藏区,大兴与藏区的茶马互市,岷江上游走廊作为连接藏区的一个通道受到明朝中央的重视。明朝初年,威、松、茂三州的藏族部落纷纷进京觐见,归附于明朝。明政府遂“设松潘军民指挥使司控制群番,为全蜀屏障。松州内外,地皆熟番,为我服役,故有八郎等四安抚、北定等十七长官司。其南路至叠溪千户所,又有郁郎等二长官司。再南至茂州卫,又有静州等三长官;其东路至小河千户所,再东至龙州,则近白马路长官司,皆受约束。”这样,明朝遂完成了对岷江上游一带的行政建制与政治、军事控制。大量汉民也在此时进入岷江上游地区。

自清代推行改土归流后,清政府对岷江上游的控制加强,促成了汉人的大量迁入。汉人带入了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使宜于农业的岷江河谷与低山得到开发,促进了当地粮食产量的增长。清代至民国,善于经商的西北回民大量南下进入岷江上游。商业的发展使较善经商的汉族与回族人口主要集中到了城镇和交通沿线,而藏族与羌族人口则主要分布在山地农牧地区,从而最终形成了今天岷江上游走廊由藏、羌、汉、回等几大民族混居的格局^{[1]143}。

(二) 岷江上游的城镇发展及分布

表 1 是岷江上游城镇的情况表。从表中可以看到,岷江上游的城镇化程度不高,全区没有一个城市,只有 19 个镇,其中 6 个是县城所在地的城镇,其他都是建制镇。

表 1: 岷江上游城镇、建置镇一览表

概 况	县 名	城 镇
	汶川县	威州镇、映秀镇、绵池镇、漩口镇、水磨镇、卧龙镇
	松潘县	进安镇、川主寺镇
	茂县	凤仪镇、南新镇
	理县	杂谷脑镇、薛城镇、米亚罗镇、桃坪镇、古尔沟镇
	黑水县	芦花镇、卡龙镇
	九寨沟县	永乐镇、漳扎镇
合计	6	19

资料来源:根据《四川统计年鉴》2006 年和《阿坝统计年鉴》2005 年整理

岷江上游的城镇虽然不大,却是四川民族地区发育较早,功能较为完备的城镇。

表 2 是岷江上游古代城镇一览表,从表中可以看到,这里的城镇从西汉时开始建立,到唐宋之后,即初具规模。

表 2: 岷江上游古代城镇一览表

城镇名	今地名	建制时间	备注
茂州	茂县县城凤仪镇	西汉三年(前 67 年)	
叠溪	今茂县凤仪镇以西 60 公里	唐贞观年间	毁于 1933 年大地震
松潘	今松潘县城驻地进安镇	南北朝天和元年(566 年)	
威州	今汶川县驻地威州镇	西汉时期	
理番	理县县城杂谷脑镇	西汉时期	

1950 年以后,岷江上游的城镇发展速度加快。特别是 1980 年以后,城镇数量、城镇人口都有大幅度增加。到 2001 年底,岷江上游已经有 19 个镇。其中,6 个是县城所在地的城镇,13 个是建制镇。

表 3 是岷江上游现代城镇结构情况,从表中可以看到,岷江上游城镇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从古到今一直在区域政治、经济、文化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城镇,一类是由于经济发展而出现的现代工业、旅游和商贸中心,一类是新兴的政治中心。

表 3: 岷江上游现代城镇结构

城镇名	形成原因	现在的支柱产业
威州镇	历史城镇	工业、商贸
杂谷脑镇	历史城镇	旅游业
进安镇	历史城镇	旅游、商贸、服务业
凤仪镇	历史城镇	旅游业
漩口镇	煤炭产地、木材转运地	建材工业
映秀镇	水电及相关产业	高耗能工业
水磨镇	高耗能工业基地	高耗能工业
米亚罗镇	木材砍伐及转运	旅游业
漳扎镇	旅游服务区	旅游业
川主寺镇	旅游景区	旅游、交通服务
桃坪镇	旅游景区	旅游业
卡龙镇	旅游景区	旅游业
卧龙镇	大熊猫保护基地	旅游业
古尔沟镇	旅游景区	旅游业
南新镇	交通要道	商贸服务业
薛城镇	交通要道	商贸服务业
绵池镇	交通要道	商贸服务业
永乐镇	历史城镇	政治中心
芦花镇	县城建制	政治中心

二、民族文化的适应性与岷江上游城镇成长

城镇化的问题,可以放在现代化的大前提下进行讨

论。事实上,现代化一般意味着经济领域的工业化、政治领域的民主化、社会领域的都市化和价值观念的理性化及其相互间的互动关系。城市的成长性,在人类学中被称为都市化(urbanization)。它是一个过程,包括两个方面的变化:一是人口从乡村向城市运动,并在城市中从事非农工作。二是乡村生活方式向都市生活方式转变,这包括价值观、态度和行为的转变。第一方面是强调人口的密度和经济职能,第二方面强调社会、心理和行为的因素。二者不可分割。因此,城镇化除了是一种生产要素的聚集过程外,也是一个民族社会文化变迁的过程,必然受到传统文化和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这些影响,也会反映在个体和群体的自觉选择上,成为影响城镇化成长的重要因素。

岷江上游是一个多民族的走廊,按照文化人类学的认识,“文化最简单的定义可以说是某一社区居民所形成的生活方式,所谓生活方式系指居民在其生活各方面活动的结果形式的一定结构,文化也可以说是一个民族应付环境——物质的、概念的、社会的和精神的环境——的总成绩。”^{[2]15}在岷江上游,由于生态环境和生产方式的一致性,各民族文化虽然各有特点,但也有许多相似性,这些相似性使得各民族的文化交流相当普遍,从而导致各民族文化的适应性更强,在某种意义上,对岷江上游的都市化具有特别的推动作用。

(一)文化的多元性和各民族的文化适应

由于岷江上游一直是一个多民族的文化交融地区,文化的多元性非常明显,使得各民族均具有一种较强的文化适应能力。例如羌族在与汉族、藏族、回族的交流中,就表现出了明显的对多元文化的适应能力。作为西北游牧民族的羌族,在进入岷江上游后,经历了对自然环境变迁的文化适应,从游牧文化转变为农耕文化,在住房上,从游牧时期的“羊毛帐篷架河边”,慢慢取来泥土、乱石、木料,依山修建三层平顶住房,现在又发展为汉式的人字架住房和平顶厨房结合的新形式;生活上从以奶肉等畜牧产品为主,而转向青稞、荞麦、土豆、玉米、小麦,进而变化为大米和各种蔬菜;在生产上,一步步引入良种和先进的施肥及田间管理方法,并且从靠天吃饭的天然农业,走向人工灌溉;在娱乐上,从传统的山歌、锅庄,演变为唱流行歌曲、看电影电视,跳现代舞;在信仰上,从传统的多神教,吸收佛教、道教、藏传佛教、基督教的各种教义,进而逐步摆脱“神”的束缚;在观念上,也越来越多地吸收外来的思想观念,建立起了农业社会的严格伦理道德体系。同时,这种文化的变迁又是在多民族共同相处、多种文化互相影响的多元文化下进行的。^{[3]P244}松潘县的藏族和回族,在长期的交往中,既保持了不同的宗教信仰和生活方式,又在生活习惯上互有借鉴,建立了良好关系。

(二)文化的多元性与文化的持续传递能力

岷江上游文化的多元性,使各民族在面对不同文化的冲击时,保持了较强的文化的持续与传递能力。

首先,在一个多元性的文化环境中,文化接纳的能力更强。岷江上游的石碉楼,在今天的藏、羌村寨都有遗存。

而据语言学家考证,其发音“邛笼”本是羌语,而汉语“邛笼”不过是它的译音,在汉晋时传入汉族地区的。而对这种建筑的来历,现代的羌族则解释为镇风水,这明显是接受了汉族的影响,因为羌族的传统中对村寨的风水没有特别的要求,其主要的功能是防御。由此可见,多元文化的环境更有利于一个民族选择性地接受外来文化的合理因素,进行自身文化的调适,而不至于反映出强烈的排斥。

其次,由于各民族文化的多元性交互影响,对异质文化的接受并不会影响文化的持续与传递能力。藏族在唐蕃时期进入岷江上游后,影响不断扩大。到明英宗时期,瓦寺土司留驻在汶川。他们与当地羌族通婚,将藏传佛教传入当地。在周围都是羌族的文化环境中,吸收了许多的羌族属民,却仍然保存着自己的文化特点。在汶川县流传着一个喇嘛和端公(释比)斗法的故事:一次簇头端公(释比)路过草坡,喇嘛正在敲鼓,忽然鼓槌粘在鼓上,脚也粘在草垫上,拿不下槌也起不得身,忙叫徒弟出去看,原来是端公(释比)正路过送鬼。徒弟请端公(释比)进去坐,给端公(释比)一碗茶喝,碗粘在嘴唇上,烫人却取不下来,人也粘在板凳上,起不了身,喇嘛自顾念经。天色渐晚,端公(释比)只好认错:“以后再不敢过路打扰了”。喇嘛让徒弟再倒碗热茶,并教训说:“我虽然被你的法术锁住,但还是照样念经,你却误了赶鬼的法事了”。端公(释比)再三谢罪,喇嘛才解了法,让其离去。^{[3]P233}这个故事中,两种宗教都有其法力,但两种宗教也都有妥协。并没有非此即彼的选择。

同样,当高山和河坝的许多羌寨已经不再使用羌语时,位于公路旁,处于汉藏回文化交汇地的汶川县河西五寨,却大体保留了自己的语言。主要原因是几寨集中形成了一个文化圈,在其他文化的促进下,加强了自己的民族认同。

这种文化的持续与传递能力,使当地群众在面对都市化带来的影响时,能够有比较充分的分辨和吸收能力,因此,都市化及其影响给当地的文化调适带来的冲击保持在可以接纳的范围内。

三、城镇成长与社会组织的变迁

与都市化相伴的是社会组织的巨大变迁。我国从1950年以后,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政治组织制度化。通过建政工作,建立了民族区域自治政权,从而使都市化成为政治制度化背景下进行的变革。

在政治制度化背景下,经济组织的商品化是由政府和市场两种力量推动进行的。因此,都市化带来的社会文化变迁往往立即反映出来。

例如,岷江上游近年来以旅游业为支柱产业,号称“东方古堡”的桃坪羌寨成为旅游热点,家家户户都参与了旅游业发展。出于对当地旅游业发展的可持续性的考虑,当地政府一直积极注意保护农民的长远利益,以使景区旅游业的收入与农民的收益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让农

民在贡献出其生存所依的资源后,自己生活的改善能和风景区的发展连为一体。为此,桃坪的开发一开始就采用了合伙制的方式。

所谓合伙制经营,指的是政府成立的景区开发公司与景区农户各自持有一定比例的股份,共同建立股份公司或有限公司,这实际上是一种合伙股份制。凡是被占用了资源的农户都可以享有一定份额的股份,这就使当地政府组建的公司与景区居民形成合伙制的法律关系。这一开发模式理论上的优点在于从机制上考虑了景区农民的长久利益,使景区开发、发展与农民利益紧密地连为一体,有利于最大限度地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使农民自觉地参与景区管理,自觉地保护生态环境和保护人文环境。在理论上是可行的,在实践中运作却面临很多困难。主要是农户、居民对现代企业制度的理解、参与和管理能力很有限,使得这种“公司+农户”式的股份制运作在旅游业中难以开展。比如,对同一景区内居于不同区位地段的农户所占股份份额如何评估?股份份额分配是以人头、按户为标准,以位置优势为标准,还是以居民所占有的资源优势为标准?这些标准的确立是否具有权威性?这些矛盾都对股份制经营产生了影响。

桃坪羌寨的开发模式就是按照合伙制的理论进行的。理县政府组建了桃坪羌寨旅游开发公司,政府占公司股份的 50%,每家农户所占份额根据其地理位置优势来划分:居于核心地带、资源保护得好、被作为重点参观对象的农户所占股份大;在外围,不作为参观点的农户所占股份少。开始阶段,当地居民积极性高,但运作一段时间后,就出现了以下问题:

1、由于门票是公司主要收入,农民对门票收入极其敏感。当公司为了业务和工作需要对部分宾客免票时,农民便自发组织起来,到景区查票。实际上,在当地旅游收入中,农民自己的接待收入不断上升,早已超过门票收入。因此,公司将股权集中在门票收入上的做法显然是引起矛盾的症结。

2、由于公司分红采取现金分配方式,农民要求多分红,而对公积金提取和资金再投入基础设施建设没有积极性,形成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矛盾。

3、由于旅游业发展形势每年都有变化,对景区贡献最大的农户也在不断变化,因此对最初确定的股份份额每年都有纠纷。

这一模式的优点在于它实际地考虑了景区居民的长远利益,短处在于将收入分配集中在门票收入上,从而引起农户在门票股份上的纠纷。

鉴于民族地区风景区的开发,要考虑在旅游地通过旅游经济的发展,建立起景区居民的社会福利保障制度,使旅游经济的发展能够让居民享受到福利,以保障居民的长远利益。因此,政府应从旅游的地税收入和土地使用权出让费中提留一部分费用,旅游企业应从企业的赢利中提留一部分费用,建立起居民的福利保障制度,使居民的医疗、婚丧嫁娶、孩子教育等各方面能享受福利待遇。

桃坪羌寨正在进行这方面的尝试,旅游开发公司的股份仍由县政府的公司和 200 多户寨民的股份构成,但公司不再注重分红,决定将 30%的股份收入用于羌寨的福利事业,对羌寨居民的医疗保险、婚丧嫁娶、孩子升学及经营得好的人户进行资金投放和奖励,也将部分资金投入羌寨的公益事业,如培训、歌舞训练之中。公司每年有红利给股民,但更注重了引导村民在旅游经济发展中学会经营管理。

由这个个案可以看到,都市化引起的社会组织变迁,既会形成社区组织的变化,也会导致职业群体的变化。由于岷江上游的政治制度化基础很强,因此,对都市化社会变迁的引导能力也较强。

四、传媒的深入和城镇化加速

都市化是一个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结合的过程,按照文化人类学家的认识,这个过程来源于新的社会文化要素的进入,“一个社会的新文化要素的源泉也可能是另一个社会。一个群体向另一个社会借取文化要素并把它融合进自己的文化中的过程就叫传播”^{[4][53]}。在岷江上游,媒介接触和传播是新的都市化影响不断扩大的重要传播方式。

岷江上游的广播电视业发展非常快。1950 年初,茂县军分区在今茂县禹乡村建起了第一个收音站。到 1953 年四川省藏族自治区(阿坝州的前身)成立时,松潘、茂县、汶川、南坪(今九寨沟)四县已经建立了收音站。1975 年 10 月建成开通 510 中波转播电台后,1979 年公社建立了广播放大站,至 1992 年已完成 536、537、538 三个中波转播电台建设。随着电视事业的兴起,1983 年公社广播放大站改为乡广播电视站。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省和国家相继实施了“千乡电视工程”、“村村通”广播电视工程、广播电视“西新”工程,大力发展民族地区广播电视事业。到 2005 年底,阿坝州有州级人民广播电台 1 座,州级电视台 1 座,岷江上游各县均建立了广播电视台。同时,数字化的中波广播转播电台和调频广播转播台都落成。利用全州广播电视传输网络实现州、县广播电视节目互传。现在,岷江上游的村镇村村通广播电视,广播电视人口有效覆盖率都超过全州 75%和 93.3%的比例。

广播电视是都市化非常有力的推动力量。一方面,它直接促进了都市化信息的传播,使政府的政策取向、先进的科学技术、城市生活方式和商品化的经营意识进入相对封闭落后的乡镇。另一方面,也培养了少数民族群众民主和理性的现代意识。我们在松潘县牟尼乡的调查中发现,当地的成年劳动力最关注的电视节目是《新闻联播》。他们认为,可以从中了解国家的政策。

总之,岷江上游的城镇是阿坝州最重要的都市化区域,由于历史上形成的民族文化多样性特征,岷江上游的城镇化具有发展速度快、社会组织变迁迅速、传媒影响深远的特点,其城镇的成长趋势十分明显。(下转第 44 页)

- niversity Press.
- [4] Hymer, Stephen : The Multinational Coporation and the Law of Uneven Development, in Bhagwati,J.(ed.),Economics and the New World Order, World Law Fund,New York ,1971.
- [5] MacDougall, G.D.A. The Benefits and Cost of Private Investment from Abroad: a Theoretical Approach, Economic Record, 36,pp13- 35.
- [6] Martin Feldstein(1994) The Effects of Outbound Foreign Investment on the Domestic Capital Stock, NBER Working Paper 4668.
- [7] Stevens,V.and R.Lipsey(1992)Interactions between domestic and foreign investment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oney and Finance, P40~62
- [8] [英国]尼尔·胡德、斯蒂芬·杨,叶刚等译.跨国企业经济学[M].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1990.

On Service Industry's Direct Investment Both at Home and Abroad

LIU Bing- quan¹, PENG Fei- ya²

(1.Economics School of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2.Commerce School of Xiangtan University, Xiangtan Hunan 411105, China)

[Abstract] The key issue of the influence of service industry's direct investment overseas in a country's economic achievements depends on whether the investment abroad is at the price of sacrificing domestic investment. When domestic resources are fully used, the domestic surplus capital will pose an inflation pressure. In this case, domestic capital invested abroad is of advantage. When domestic capital is not fully used, but structural surplus occurs, under such circumstances, investment abroad still depends on the size of profit rate of the investment both at home and abroad.

[Key words] service industry's direct investment abroad; domestic investment; experiential analysis

(上接第 34 页)

参考文献

- [1] 石硕.岷江上游走廊的历史演变和民族文化特点[A].四川岷江上游历史文化研究[M].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1996: 43.
- [2] 费孝通, 王同惠.花蓝瑶社会组织·吴文藻导言[M].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88: 5.
- [3] 徐平.羌村社会[M].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3: 233、244.
- [4] C·恩伯, M·恩伯.杜杉杉译.文化的变异[M].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8: 535.

An Analysis of the Growing Elements in the Towns along the Minjiang Upper Reaches

LI Jin

(Institute of Nationalities of Schuan Province, Chengdu Schuan 610017, China)

[Abstract] The towns along the Minjiang upper reaches are the most important urbanized regions in Aba Autonomous Prefecture of Tibetan and Qiang nationalities. Due to the diversified national cultures formed in history, the towns along the Minjiang upper reaches take on features like rapid townified growth, swift shift of social fabric and far- reaching media; their urbanized tendency is quite distinct.

[Key words] the Minjiang upper reaches; town; growth